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边疆史地研究基地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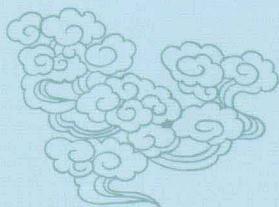
文学理论与民族文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 钟进文

本土的张力

刘大先 主编

——比较视野下的民族文学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边疆

文学理论与民族文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 钟进文

本土的张力

——比较视野下的民族文学研究

刘大先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土的张力：比较视野下的民族文学研究 / 刘大先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 - 7 - 5161 - 3137 - 4

I . ①本… II . ①刘… III . ①少数民族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 ①I207. 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019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周 晓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 文 域 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335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言：民族文学的跨界、翻译与超越 刘大先 (1)

一 学术史及基础

比较文学视阈下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 汤晓青 (21)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回顾与展望 姑丽娜尔·吾甫力 (32)

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反思 朱斌 张瑜 (45)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范畴 吴雨平 (56)

先锋与抑制：一个比较的视野 姚新勇 (66)

“走出”的批评：关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多样性与

“单边叙事” 欧阳可惺 (76)

二 个案研究

论鲁迅对少数民族文学潜在基质的唤醒 张直心 (93)

论老舍与 R. K. 纳拉扬小说的底层叙述 续静 (106)

论诗人阿来对聂鲁达的艺术借鉴 张敏 (115)

新疆三大文学作品与蒙元时代“中间地带的文明效应” 杨亦军 (123)

壮族布洛陀信仰与侗族萨岁信仰的比较 李斯颖 (135)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以《马五哥与尕豆妹》和

《王贵与李香香》的对比分析为例 毛巧晖 (147)

东南亚与中国西南边疆民族戏剧的交流与共生 黄玲 (159)

汉、壮文化的交融与疏离

——“歌圩”命名再思考 梁昭 (172)

三 相关学科借鉴

在口头传统与书写文化之间的史诗演述人：

- 基于个案研究的民族志写作 巴莫曲布嫫 (187)
中国文化的构成与“少数民族文学”
 ——人类学视角的后现代关照 叶舒宪 (208)
文明对话中的“原住民转向” 徐新建 (222)
“第四世界”的文化遗产：一个艺术人类学的视野 彭兆荣 (232)
当代母语文学跨语际传播的困境与新路 李晓峰 (248)
现代台湾原住民女作家的身份认同：矛盾与抉择的呈现 周 翔 (257)
文化话语研究与少数民族文学的新视野 施 旭 陈 珏 (267)
论出版传媒对新时期贵州少数民族诗歌的影响 彭冠龙 颜同林 (278)
人类学视野中的少数民族电影 刘大先 (286)
- 后记 (296)

导言：民族文学的跨界、翻译与超越

刘大先

“比较文学”是个含混的词组，它同时兼有方法和学科的双重意味：就前者而言，是因为比较的视野几乎是进行任何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基础，没有辅助、映照、对比的他者文本与思想材料，局限于某个单一作品、作家与现象，不可能形成具有学理性和知识性的判断与结论，充其量是个自恋式的自说自话；就后者而言，则更有着一个多世纪的学术史积淀，并且在学科自身的流变之中形成了区别于浮泛比较视野的独特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论。本书取名“比较视野”则除了包含上述两重含义之外，更有第三种意义，即一种相对的、多元的认知范式和对既有“比较文学”学科及其方法论超越的期望。

一般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因为该学科的西来传统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比较研究，因而在总结比较文学开放性和边缘性的基础上，将其基本特征归结为跨越性，即跨国家、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方法等。晚近数十年，比较文学自身的理论与视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译介学、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逐渐突破了传统平行研究与影像研究的窠臼。尽管如此，一国之内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仍然是个较为敏感的话题。这个话题至少在三十余年前的80年代季羡林就曾提到过，不过此后并没有形成有意识的理论自觉，然而近十余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因缘际会，受惠于综合国力的增长、国内外文化交往的增多、传媒技术的更新，族别之间的比较、与域外他民族比较、由特定族群文学观念出发形成的创新性理论观点已经渐成气候，是进行一定的总结和理论提升的时候了。

“少数民族文学”在其学科建立之时，有其国家民族政策平衡和文化平权的特殊性，而某些主流学科的学人囿于历史感的匮乏和学术视野的褊狭，

往往在本学科中故步自封、坚壁清野，以一种无知无畏的傲慢态度质疑“少数民族文学”的合法性——它们似乎只能局限于“民间文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神话学”、“宗教学”、“史诗学”等名目繁多的学科夹缝之间踽踽独行。^①这倒让我想起以比较诗学著称的迈纳（Earl Miner）说过的一段话：“我们的各种专业研究机构越来越注重我们大多数人还不太熟悉的那些文学（包括我们自身文化中潜藏着的文学），真正把它们纳入到了研究计划之中，不再只是把它们视为无足轻重的杂要了。然而，这里存在一种奇特的不平衡现象。我们的社会机构（包括大学在内）助长了我们中间那种认为研究西方文学的人不需要广泛阅读其他民族文学的不良倾向。另一方面，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系科的研究者们却被迫一直与西方文学研究现状看齐。结果是他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而我们却不知道他们所知道的。很显然，我们中没有谁能够全部了解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学和诗学。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和诗学研究要求我们进一步拓宽想象力，因为过去习惯了的想象力远远不够。比较研究的智识标准还有着清晰、强烈的伦理意义。如同女权主义者所坚信的男女两性应该平等这一观念一样，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地球上其他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的人种也应该加入到任何以比较为主导的文学研究中来。我希望能够宣称自己是在为人类的文学而歌唱，以激起众多的缪斯一起歌唱。”^②不光是研究“西方文学”的学者应该有此自觉意识，研究主流汉语言文学的学者同样应该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以及它们以汉语言进行记载、创作和传承的文学当作一种不可或缺的参照物，否则，就会出现“他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而我们却不知道他们所知道的”局面而不自知。

迈纳认为，每一种文学体系都植根于其特定的诗学和文学传统的土壤中，因而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发现很难用某种定于一统的“文学”观念去界定、衡量、评判纷繁复杂的各种文学现实实践。现代中国文学学科中的“文学”观念基本上是随着现代大学文科教育、普通民众文学实践和文学知识观念的更新，对传统中国文化中文学观念的逐步扬弃，而逢译运用西方概念并努力使本土材料与之适应而来。当这种西方现代文学观念逐步成为本土现实之后，又用之去回溯、规约、梳理、整饬古典或现代文学材料，形成为中国文学的知识体系。少数民族文学一方面迥异于主体民族的文学思想和系

^① 刘大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刘大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检省》，《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6期。

^② [美] 迈纳：《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统；另一方面，受限于现代政治、社会、文化变革的时代需要而处于无名的状态，一并遮蔽在这一套现代文学知识话语之中。^①然而，如果考镜源流西方文学观念也并非定于一统、固于一体、统于一端，它自身也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嬗变。仅就诗歌体裁而言，据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的说法：

传统的诗学体裁或门类三分法：史诗（叙事诗）、戏剧、抒情诗，实际上同希腊天才们最初发现的体裁的“自然”划分相去甚远，并没有出现于前亚里士多德的创造性时代或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著作中。这种三分法不如说是一个漫长而沉闷的累积和调整的过程的结果，是通过对传统的诗歌体裁罗列的带有细微变化的因袭而得出的，直到 16 世纪才演变成了现代的公式。

在伟大的雅典时代，我们找不到一种简单、清晰的分类，却可以发现关于特定体裁的形形色色的术语名称：史诗或朗诵诗、戏剧或表演诗，后者还可以细分为悲剧和喜剧；还有抑扬格诗或讽刺诗（之所以成为抑扬格诗因为是按照抑扬格律创作而成的），以严谨的格律写成的挽歌，具有分支的挽歌对句（elegiac couplet）、警句和格言诗（因为是按照相同格律创作而成的，所以所有这些诗体可以归为一类）。后来出现了“歌诗”（这是后世的称法）或者说是一般由合唱队在长笛或某种弦乐器伴奏下唱的诗。“歌诗”和我们的抒情诗概念最为相近，但它还不包括我们会认为是基本抒情式体裁的挽歌（elegy）和格言诗（epigram），后者发展成为以后的希腊诗选中优美的抒情诗。此外还有颂歌（hymn）、长曲（dirge）或哀歌（threnos）以及酒神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甚至都没去一一列举出这些体裁，而是聚焦于悲剧、喜剧和史诗三者之上，只是偶尔提及其他体裁。

现有记载中最早把抒情诗作为体裁提及的文法学家是公元前 2 世纪的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Dionysius Thrax）。他提出的一系列体裁如下：悲剧、喜剧、挽歌、叙事诗、抒情诗、哀歌（葬歌）。^②

这是对西方文学历史中诗歌分类的一管窥豹，中国汉文书写系统的语言文学体裁也经历数变，在现代被追认为“文学”的内容恰恰是经史子集的前现代知识系统中最不受重视的诗词歌赋。所谓“文学自觉”的魏

^①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1—32 页。

^② 见杜萌若、胡燕春主编《比较文学理论导引》，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7 页。

晋时期，对于文学体裁的辨析依然是众说纷纭的。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八体^①；陆机的《文赋》扩充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体^②；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言：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诗，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仪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

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③

刘师培《魏晋文学之变迁》言挚虞“于诗、赋、箴、铭、哀、词、颂七杂文之属，溯其起源，考其正变，以明古今各体之异同”。^④李充的《翰林论》对文体论也各有说法。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叙笔”，则以“文”和“笔”为别，分为35种文体。所谓“文”，指重在抒情言志、讲求音韵文采的作品，如楚辞、诗、赋、乐府等；“笔”主要指政治学术性的、不重音韵文采的作品，如史传、诸子百家之文等。不过，无论“文”、“笔”，总需要找到其本体上具有神圣价值色彩的根源：“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⑤也即是说，中国的“文学”从来都没有“纯粹”过，其传统一向

^① （魏）曹丕：《典论·论文》，见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59页。

^② （晋）陆机：《文赋》，见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175页。

^③ （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见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90—193页。

^④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⑤ （梁）刘勰：《文心雕龙》，见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页。

以“道”、“圣”、“经”为旨归。这种知识的等级格局，贯穿于科举制度的始终，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向来处于这个体系的底端。当然，即便是这个“文学”，其内部也极其复杂，清刘熙载《艺概》中论文、诗赋、词曲，诗歌中也分古体、近体、乐府，律诗、绝句、五言、七言等^①，直到晚清，文学观念依然是颇为含糊的，小说是到了近代批评才独立出来的概念，这个时候“文学”这一概念逐渐通过学习日本对于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译介，而慢慢获得其现代含义。但是文学观念依然有个漫长的转变过程，并且不时会有迂回、反复和重新界定。

而即便是在慢慢成形的现代文学学科格局之中，少数民族文学还是很难在既定文学知识结构中获得言说资格的多样性。维吾尔族的达斯坦、哈萨克族的阿依特斯、达斡尔族的乌钦、蒙古族的好来宝，以及诸多后来被各种学科方法论分割肢解了的故事、传说、歌谣、乐曲、子弟书、宝卷抄本等，这些文类都有其源自本族群或地域的文化、美学、情感与政治内涵，不能因为无法收纳进通行文学知识范型之中，就注定要沉寂在特定时代文学话语的幽暗背面。近半个世纪来整个学术话语的刷新，为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了重新发现的契机。我们如今可以说，一国之内的多民族文学比较同样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它因应着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和作为文学及文学研究语境的整体社会文化结构的重组。就比较文学话语而言，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视野，也是对于欧美比较文学传统的突破。

根据季羡林 1981 年的说法，狭义的比较文学或者说“原始的”的比较文学，是 19 世纪前半叶源于德国，而作为一个有比较牢固理论体系的学科却是 20 世纪之后很晚近的事情。他将比较文学归纳了德国学派、法国学派、西欧学派、美国学派四个独立分支。^② 他在不同场合都呼吁要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后有中国学者总结，将中国新兴的比较文学研究列为中国学派，“法国学派以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以及异域形象学等构成影响研究的诸研究领域，美国学派则以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跨学科研究等构成平行研究的诸领域，而中国学派则以异质文化中的双向阐发和异质比较、对话、融会法来构成跨文明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范式。”^③ 一般而言，比

^① 刘熙载著，袁津校注：《艺概注稿》，中华书局 2009 年版。

^② 季羡林：《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季羡林文集》第八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9 页。

^③ 曹顺庆：《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8—119 页。

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跨界性，而研究范围则包括对不同文学体系的实证关系研究，各种不同文学体系彼此之间的变异研究，建立在文学类同性基础上的平行研究，以及追求多元文明时代的总体文学等四大部分。回顾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一般都会认为影响研究强调文学关系的重要性，平行研究则注重对比中的兴发关系，而接受研究则属于一种对文学变异的考察，它们是不同层面的研究模式。具体而言，影响研究的传统下，包括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形象学等分支；平行研究的传统下，涵盖着本科研究包括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类型学等，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历史、哲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等的比较。跨文明研究则包括跨文明双向阐发、异质比较研究、文化探源研究、异质话语对话理论、异质文化融会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等。^① 不同族群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显然是跨文明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在已有的论述中却依然付之阙如。

循着跨文明研究的这一思路，自然就会引申到文学人类学的提法。早期从事接受美学研究的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后来便转入文学人类学（Literary Anthropology）的思考^②。较早对文学人类学进行探究的中国学者一般是从神话与原型入手，比如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主要引入原始主义批评和神话原型批评的方法^③。萧兵、叶舒宪的一系列著作也是以此种神话研究或原型批评的视野对古代典籍进行重新解读及其与西方神话对比开始。^④ �嗣后不久，叶舒宪等人开始从文学转到引入人类学的相关理路。^⑤

^① 曹顺庆：《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② Wolfgang Iser, *Fiction and Imagination—Charting Literary Anthropolog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像：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汪正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④ 萧兵：《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萧兵、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叶舒宪、萧兵：《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前古典与后现代的视界融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萧兵：《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萧兵：《中国上古图饰的文化判读》，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⑤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探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酒神及其祭祀仪式的发生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经过此前几年的积累，2005年5月13日至5月17日在湖南湘潭召开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第二届学术年会可以视为在方法与视野上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届会议设置的主题包括：（1）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2）文学与仪式、文学与疾病、文学与神话；（3）文学中的神秘主义和原始主义；（4）原型批评在中国；（5）文学与性别；（6）口头诗学研究；（7）人类学电影，文化与图像；（8）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我参与了这次会议，颇感觉这些主题细大不捐，几乎囊括了文化人类学的所有内容，因而也导致了“文学人类学”的泛化：既然这些原本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内容，那么单独拎出“文学人类学”的意义又何在呢？又如果仅仅是将人类学的视角引入文学批评与研究，那么它同一般的西方文论研究或西方文论的“本土转化”有多大区别呢？该次会议主要成果收罗在《国际文学人类学研究》中^①，内容包括国家地理与族群写作、逾界的想象、现代人的认同危机与怀旧情结、人类学小说试论、本土人类学小说对批评的挑战、陇东民间小戏的人类学解读、神话研究、蒙古神话研究综述、理论研究、人类文学大系统的分类结构、面对哲学的人类学家、萨满教与中国文化等，同样存在着上述问题，即无边无涯，缺乏学理性的严格范围。

“文学人类学”如果要表现出其独特性，那显然突出地体现在它的想象与表述上，它通过叙述、虚构、语言、文字的表述来重新塑造世界，这一点在晚近逐渐也为相关学者认识到。^②就中国各个族群文化而言，不同的文学表述，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动力系统，也是进行文学比较的基础。各个族群的文学与文化尽管有着强弱之分，但如果赋予其平等的历史考察与比较基点，则将打破王朝正史系统的叙事法，刷新既定的中国传统与“文学”观念，乃至为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塑造新的面貌和图像。

事涉“表述”，语言与翻译问题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命题，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语言文学的互译一向较少为文学研究者所关注，而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权力与政治交织下的文化网络则是理解中国不同民族文学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关键。不同族群文学之间的翻译总是权力沟通、互动、妥协的结果，从而形成了差异补充、中介传输、文化增生的功能。如果要解除少数民族文学因为弱势而产生的阐释焦虑，则有必要将中华民族内部语言与文学的多样

^① 史忠义、户思社、叶舒宪主编：《国际文学人类学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徐新建、唐启翠：《“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核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徐新建教授访谈》，《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2期。

性落实于具体的研究范式之中，以同情的理解促成多民族文学的和谐共生。^① 21世纪以来，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世界性命题之下，中国文化主管部门加大了对于少数民族母语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扶持力度。除了在某些民族地区的中学与大学实行双语教学之外，以文学而言，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2009年中国作家协会专门刊发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民族文学》创办了蒙古文、维吾尔文、藏文版，2012年，哈萨克文、朝鲜文版也陆续创刊。与此同时，各类鼓励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与汉语文、外语文之间相互译介的工作也呈现兴盛的势头。这种新兴的一国之内不同语种文学之间的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个饶有兴味且富研究价值的文化文学实践。而关注文学翻译的研究路向因应了比较文学界“从比较到翻译”的译介学转向。

很长时间以来，文学翻译文本较之原创文本都被视为派生性和次等性的，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指出，根据二元模式，一个好的比较文学家应阅读原著，这是一个比读任何译作都要优越的阅读形式，因而那种强调源文本高级与中心论的二元比较研究是反对翻译的观点。但是她历数文学史材料，发现晚近的学术趋势中，翻译不再是次等的、边缘的活动，而是可以看作文学史内部的一个主要成形力量。^② 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认为12世纪标志着西方文化最主要的转变期之一：从史诗到浪漫主义的转变……展现了从传统的口头的英雄传说说到书写的、作者革新过的文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包含大量的文学要素如文学样式、人物类型的转变；也包括形式的转变如韵律、修辞手法以及类似的转变；同样也有意识形态的转变，它涉及从骑士文化精神到宫廷显贵文化模式的转变和对浪漫主义爱情的赞美，翻译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③ 因而，他基于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于70年代就提出了关于解释文学翻译活动受除文本以外的社会文化等因素制约的多元系统理论。1976年，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也提出应该将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进行，标志了比较文学广义上的“文化转向”。在他看来，翻译无疑是一种文

^① 刘大先：《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语言与表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5期。刘大先：《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权力与政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② [英]苏珊·巴斯奈特：《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见杜萌若、胡燕春主编《比较文学理论导引》，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260页。

^③ Itamar Even-Zoh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Historical Poetics*, Tel Aviv, 1978.

学传播活动中必然的再写现象：“再写，或以批评的形式或以翻译的形式（同时，我还加上，或编史和人类学的形式），成为非常重要的策略，文学监护人用此来改写那些‘外来物’（在某时或地理位置）以符合接受文化的标准。正因为如此，再写在文学系统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另一水平上，再写有接收的迹象，也可以根据此来分析它。这看来就是给再写以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中核心地位的两条最好理由。”^①

从中国文学历史来看，城外文学的翻译与本土文学的变化与繁荣关系密切，本土内部汉语言文学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之间的译介是彼此发生转变的重要契机与原因。彝、藏、维、哈、蒙、满等古代文献中都有关于翻译的论述，而中国比较文学的学者更多忽略了这方面的内容。以近年来发展出的“译介学”为例，它包括翻译文学史、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文化意象的传递、误译等问题的研究。按谢天振所言：“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②这种转变可以视为比较文学的文化学派对语言学派的否定，虽然它力图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却也给它注入新鲜的活力，它们尤其强调的翻译不仅是语言间的转换，而是文化间的汇通，是理论上的创新。对于有着极其复杂多样的母语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象而言，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就显得更加重要：它提醒我们在汉语文学与少数民族语文学的交流中可能彼此都时常存在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倾向，从而为不同族群的理解与宽容开掘新的通道。

“文化转向”导致了所谓“无边的比较文学”的趋向。雷马克（Henry Remark）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中认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

^① André Lefevere, “What is Written Must Be Rewritten”, Julius Caesar; Shakespeare, Voltaire, Wieland, Buckingham, Theo Hermans, in *Second Hand: Papers on the Theory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Antwerp, ALW—Cahier, 1985 (3), 88–106.

^②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即除了跨国文学研究之外，也可以对文学和人类其他一切学科领域进行比较研究。为了避免大而无当，雷马克还提出“系统性”的限制。^①然而，这种观点依然囿于学科门户之见，对于学科的发生学本身缺乏反思，需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个突破，不过它扩大了比较的视阈，为无边的比较文学埋下了伏笔。如同有学者指出的，“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文化批评的兴盛，人们又试图用文化研究来取代比较文学研究，对于这点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过批评意见，他们或是批评其研究中的泛化现象，或是重新强调其研究中的‘文学性’或‘诗性’成分，以此来防止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实体‘不在场’的现象。然而他们的努力好像未能阻止比较文学研究继续出现‘无边化’的趋势”。^②巴斯奈特的翻译学观点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了，因为女性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这三个方面所涉及的跨文化研究，已经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应将翻译研究视为一门主要学科，并将比较文学视为其中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范围。^③

文化研究的理念从 60 年代之后逐渐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主流之后，原先研究的领域向政治学、社会学、影视、商品、日常生活审美等领域扩张，造成了经典比较文学学科的式微。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专门写过《一个学科的死亡》^④，而她本人就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以印度庶民研究和女性主义言论闻名。该中心的另一位学者刘禾则以话语的跨语际实践为核心命题展开有关中国现代文学、晚清中英外交研究以及帝国与技术、新媒体研究的^⑤——比较文学同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乃至艺术史、建筑学之间日益密切的关联已经到了不得不重新思考所谓“比较文学学科”本身的内涵与外延、对象与方法的时候了。

法国学派的形象学向媒介研究的转向是晚近比较文学的另一个重要趋向，与英美文化研究异曲同工。如同法国学者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

① [美] 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见干永昌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 208 页。

② 张旭：《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③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 161.

④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Death of a Discip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⑤ 近著如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三联书店 2009 年版。Lydia H. Liu, *The Freudian Robot: Digit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Unconsciou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所说：“现在更有现实意义、更有用的事情，是不再去思考‘再现’（représentation）的概念，而是去思考‘媒介’（médiation）的概念。需要强调指出，媒介与再现共处于同一个社会集体想象的语境中，而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应维持这种语境。”^① 身处新媒体、全媒体、自媒体的时代，文化文学间的交流已经与之前的传播语境大有不同，重新审视媒体与传播内容之间的互动，更利于理解文化多样性的关注及这种关注背后的话语关系。巴柔进一步分析，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首先是对某些探索或研究的主题化。更深一步讲，它远非一种方法论，而更接近于一种意识形态。它或许是个人主义或种族主义的一种有效的平衡力量，因此，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伦理学。从多元主义到“数种文化共存”的话语过渡，反映了一种处于比较文学中心的概念的重新表述：如何去思考各种文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关联与对话。针对文化间性的文学研究意味着文学应当被看作跨学科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朝向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人类学或社会学开放的领域。但是，社会科学必须使我们可以更加丰富地回归文学。简而言之，这意味着针对文化内涵的研究（即文化研究）不能取代文学现象的研究。因此，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发展一种内在的或“国家内”的研究，与一种陆地间或跨国界的思考齐头并进。正是这一点上，“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发展起了主导作用，它们将“边界”的概念放置到了探讨的中心（包括经济、文化和种族）。由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力克斯·迦塔里（Felix Guattari）提出的关于卡夫卡的“小文学”的概念，可以帮我们去理解对一种书写文字的选择、作家的位置以及它造成的后果。

多元文化主义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叛，然而它自身也是西方学术脉络中自我反思的一个部分，如同吉拉尔德·吉列斯比所说，“我们不能武断地将欧美相对主义的标签贴到其他文化上”^②。保罗·柯奈阿也指出，“过分重视个别性和地域性，常常会同民族主义合流。这与我们所处的经济、技术、交通、环保和生活方式全球化、开放边疆和国家主权消减的时代是十分矛盾的。……在当今西方宽容的知识界有一种精神的极端自由主义风气（禁止被禁止了）和一种后现代的浅薄的纵容（每种思想都有其价值）。”他进而

^① [法]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间性：从形象学到媒介》，见乐黛云、孟华主编《多元之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② [美] 吉拉尔德·吉列斯比：《文化相对主义的意义与局限》，见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认为：“有时我们还需重复一些老生常谈。我们固然扎根于一定历史、语言和文化之中，但首先，超越于个体主义之上的，是我们有生物学——躯体的和精神的共同结构，这是千万年来所不变的。在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形态中，不论其进化水平如何，都可识别出认知、娱乐、信仰和艺术创造等等天赋，人们通过一种语言来整理各种印象，对世界进行分类，并互通思想和感情。所以不仅存在一个差异的基础，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基础，它指向人类的同一性。正是人类的同一性使我们能够超越古代、中世纪和现代，超越民族和陆地的界限而融入一种有着相似创世神话和艺术杰作的共同体。”^①

归根结底，比较文学始终有种“异中求同”的思维底色。正如钱锺书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②这种全球性的整体性视野是人类学的基础观点，其思路的根底是结构主义式的认知图示：在一个整体性的结构中，任何部分都与整体有着割裂不了的关系，它们的参差多元才保持了整体的有机性，而比较的方法则是基本的研究取径。如同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种族与历史》中指出的，世界文明只能是在世界范围内的联盟，所有的文化都要保存自己的独特性。^③但因为15世纪之后的一系列贸易、殖民、知识传递活动造成的文化等级论，已经成为文化平等的一大障碍，所以对于之前一元化的价值标准进行反思是必要的前提工作。世界主义的文化等级论造成了既有的复杂性，“文化的优劣分等依然只是某些人正着手推行的计划，而且就像有人对所有文化一律持平等尊重的态度一样，同样也有人会对某些文化持蔑视鄙薄的态度。东方主义的那些溢美之词，在本质上和世界主义不谋而合，因为它们的赞美只属于过去，属于古代印度创造的奇迹；也许它还含有对现在的责难抑或怜悯。正是这样，文化相对主义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即使没有它的那些评论文章和它所表明的态度。文化浸染是个历史问题，排除它的可能性就是排除历史存在的可能性。实际上，文化相对主义假定的是文化本体的非历史化。然而，文化真能是非历史的吗？文化自然有其自身的历史，它循着一定的轨迹向前发展，无论多么缓慢，总能为人所察觉。但是，不管两种文化是如何独立和纯粹，仍有一种历史将二者联系起来。这一历史是如此具有渗透性，很少有一种文化

^① [罗马尼亚]保罗·柯奈阿：《相对主义的挑战和理解“他者”》，见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8页。

^②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重排本）下，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

^③ [法]列维—施特劳斯：《种族与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